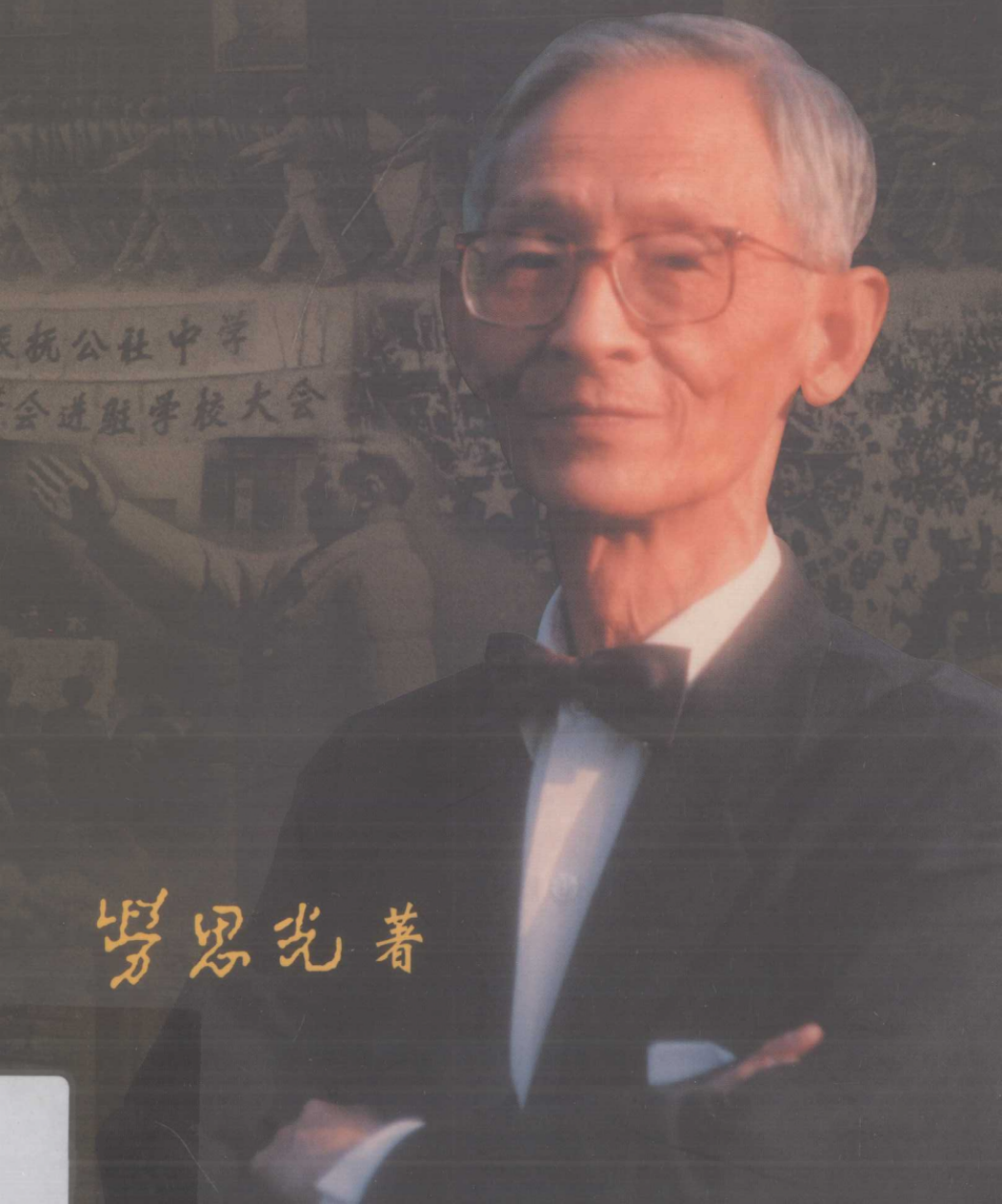


●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六)

中國之路向新編



思光著

中國人為中國找尋出路已經將近一個半世紀。自清代同治(1862-1874)以來，便有追求國家富強的「洋務運動」，然後三翻九轉，各種口號此起彼落，許多文化和社會革新運動都在中國出現；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號召的「現代化運動」為止，似乎又回到這種翻騰中，中國的內在問題與體的精神崩潰的危機正籠罩著，力也似乎步步衰弱下去了。悲觀地歎息，還應該有承擔路向的問題。本書以清晰的思路和淺易的文字，先對中國所處的歷史困境作一客觀的分析，然後就脫離困境的路向作出判斷和建議。新編版還收錄了勞思光教授有關中國路向問題的訪談內容，以及專為新版寫的序言。關心中國歷史命運者不可不讀。

勞思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人、台灣清華大學、師範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現任台灣華梵大學講座教授、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2000-2001年度訪問教授。著作包括《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康德知識論要義》、《歷史之懲罰》、《中國文化要義》、《中國之路向》、《思光少作集》七卷、《解咒與立法》、《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思辯錄》、《思光詩選》等約三十餘種。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62-201-901-3



9 789622 019010

●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六)

中國之路向新編

勞思光 著 劉國英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總序

勞思光先生過去四十年來，執教於港台兩地，作育人才不計其數。期間，先生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淵源尤深。先生自一九六四年受聘於中大，至八五年底榮休為止這二十幾年間，首先任教於崇基學院當時的宗哲系。根據一些學長的憶述，早期的宗哲系本以宗教為主，而哲學組別當年的所有課務，幾乎全都要由先生獨力肩負。除此之外，先生當年對崇基的通識課程的改革，出謀獻策以外，還於具體的課程設計和教材編寫工作上，付出了不菲之心力。隨着大學制度上的蛻變，和新亞、崇基兩院哲學課程的合併，先生除進一步參與重組課程工作外，更曾出任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之職。八六年以後，先生於中大曾先後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和逸夫書院高級導師。先生之於中大，可謂鞠躬盡瘁。

先生治學，素稱嚴謹，其於學術上樹立的典範，亦早昭著於海內。然而，最令我們佩服的，是先生從來不把自己的學問與思想限囿於學院之中。先生心中的哲學是康德所謂的「世界哲學」。先生自己長於理論，但其真正的關懷卻絕不止於純粹理論的層面，而直指向傳統的觀念制度、現實的社會文化，乃至國族的歷史命運。先生反思之餘，運筆成書，與其說是為要譽於學術同儕，不若說是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坦蕩蕩的一份報國情懷。先生問學，一向講求「尊理」，亦不輟地以此責求於天下間的學子。是以先生的著述之中，除了許多理論性的重點著作之外，亦不乏把哲學向社會上普羅青年讀者推廣的作品。

先生半生著述、先後出版過的論著，難以勝數。其中部份論著雖已絕版多時，但坊間訪求者，仍日有之。台灣的時報出版公司於八十年代中曾把先生早年(至五七年止)的文稿輯成《思光少作集》七卷刊行，多年以來，已於各界廣為傳誦。是次出版的《思光學術論著新編》，計劃中共有十三卷。按年代而言，《新編》基本上收錄了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的主要代表作品。《新編》所收各卷，除一二例外，基本上以先生從前刊行的專著為藍本。然而，這次重刊，除重新校訂舊有書稿外，如遇有題材相關、而以往尚未收錄於書的文稿，亦將審情收錄，以免遺珠。至於先生於中大任內完成的《中國哲學史》三卷，固可說是先生的代表性力作，但由於已供台灣三民書局再版重印，因此這次未列於《新編》出版計劃之中。

《新編》的出版，首先要感謝的，是勞先生本人的首肯。其次，我們要感謝友聯出版社林悅恆先生慷慨回贈勞先生原於該社出版的書籍的版權。就物質條件而言，中文大學出版社上下的支持，當然是計劃得以順利完成的主要關鍵。此外，中大副校長金耀基教授對出版計劃提供的寶貴意見，亦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在此一併致謝。

中國人文學會編輯委員會
關子尹、張燦輝、劉國英
識於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九八年仲夏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編校凡例

(一)《新編》以重刊勞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刊行成書的學術著作為主。於重編時，除校訂原本外，若遇有題材相關、卻未曾收列於書之文章，均審情採用，收作附錄。

(二)勞先生同期發表的其他論文中，不乏已有輯錄成書之條件而終未成事者，是次新編，將按題材匯編成冊。

(三)重編各書時，基本上按舊作重校；除訂正誤植及漏植之文字外，內文原則上不作改動。

(四)標點符號依現今通行的法則作適當之修訂。

(五)編者為求文義更清晰而偶爾加插的文句，均置於方括號〔 〕中，以資識別。

(六)源自外文之哲學術語譯名，悉依勞譯；原文只有外文之術語，在可能情況下提供今日通行的翻譯。

(七)外國人名翻譯，如與今日通行中文譯名有別者，均依今譯修訂；原文中只有中文譯名者，則附上外文原名。

(八)原文中如出現古體字或異體字，於不影響原文文義之情況下，均改用今日通行的字體。

(九)為方便編排與閱讀內文出現之外語文字，《新編》各書一律橫排。

(十)一切註釋，皆統一為書頁下之腳註。

(十一)重編各書之章目，以及附錄文章之名稱，悉依初版；若有需要，則適當地加上小標題。

(十二) 新編各書、如外語學術名詞及外國人名出現頻繁、均於書末附上中外人名及學術辭彙對照表。

《中國之路向新編》小序

《中國之路向》原是一本專討論文革後的中國問題的小冊子，不算是學術性的論著。但我在這本小書中特別提出「革命特權」的觀念，來指述各種革命專政運動的結構性的病痛，可說是我在政治理論方面一個重要的批意見。對於研究中共問題的人說，這個論斷應該值得參考。

我是六〇年代寫《歷史之懲罰》，是在文革以前；當時心情甚為低沉。到了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口號，造成共產世界的大變化。我即寫這本小書，探求中國之路向。這已是七〇年代的末尾。我下筆時，蘇聯的「新思維」尚未出現。但我已預感到共產主義運動到了解體階段，因此，我這時心情轉為樂觀，對世界秩序的重建及中國的脫劫重生都有正面的期望。因此，我當時曾向友人們說，到了八〇年代，我會再寫一本「中國之希望」，配成三本時論。然而，八〇年代的末期，中國卻發生了「六四」之變：一個未成熟的民運，結果竟造成中國形勢的大逆轉。我寫「中國之希望」的計劃即從此擱置。今日已是二十世紀的末尾，我卻只為舊書作序，不免有今昔之感。

我談「中國之路向」時，原以中國的大改革作為背後設定的構想。事實上，則二十年來，蘇聯及東歐脫離馬列主義運動，而中共反而假借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延續專政制度；結果使中國大陸的政制改革愈來愈無力。而世界形勢則在冷戰結束後，墮入一個衝突之網中。看不見任何共同理念的建立，自然說不上新秩序了。

專就中國而言，台灣雖勉強實行民主化，但制度改革未經過足夠的培養階段，違背「成熟原則」；因此，台灣顯露的社會病，幾乎成了「惡質民主制度」的示例，不經過一番大手術，似難入正軌。大陸的中共則只在一套意義朦朧的口號下，極力維持專政局面。結果只看見人人爭利，處處專權；結構性的老病未能治療，種種權宜的策略又不斷造成價值標準的扭曲。更不幸的是：世界思潮正走向虛無化，中國又不能免於這種種外來衝擊。今日再看中國之路向問題，似乎要擴大問題，從世界之路向着眼，方有可能的解答。我當年寫「中國之路向」時的樂觀心情也早已消失了。

若是我有充足精力和時間，或許面對這裏的繁雜問題可以作一點全面性的探究。但以現況而論，未必有此機會。我今天為《中國之路向》作序，只能寄望於下一代的朋友們，希望有人能認真為中國及世界勘定路向。

一九九九·序於台島

目 錄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總序	v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編校凡例	vii
《中國之路向新編》小序 (一九九九)	ix
第一部份 基本了解	1
引 言	1
一、路向的意義	2
二、中國路向問題之形成	3
(一) 中國困境的形成	4
a. 就觀念層面說	8
b. 就制度層面說	10
(二) 中國之反應	13
a. 「換體」的幻想	21
b. 「掘寶」的幻想	25
c. 「求仙」的幻想	27
(三) 當前的難題	30
a. 由共產主義運動生出的問題	31
b. 由中國傳統自身生出的問題	40
c. 客觀事實一面的難題	46
第二部份 路向的擬議	51
引 言	51
(一) 掃除幻想、確立共同目標	53

(二) 理性化原則及其運用	54
一、對文化傳統的主張	54
(一) 從多元主義文化觀出發、保存中國文化的成果	55
(二) 承繼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普遍意義的開放成分	55
a. 自我主宰性的肯定	55
b. 「和」的觀念	57
c. 「理性」與「情意」的互補作用	57
(三) 補正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內部缺陷	58
二、對現代化問題的主張	59
(一) 「現代化」一詞的涵義	59
(二) 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幾點具體建議	62
a. 在觀念層面看	62
b. 就制度層面看	64
三、對實踐程序的主張	69
(一) 就大陸說	69
(二) 就台灣說	75
(三) 就海外說	79
附 錄	
附錄一 勞思光談中國之路向	83
附錄二 與《中國之路向》有關的幾個問題之補充說明——致《新編版》編者的信	101
編者跋	105

第一部份

基本了解

引言

在這本小書裏，我想對中國的路向問題，作一番客觀的探究。這當然要牽涉到對於一些已有的論調和主張的批評；最後我將說出我自己的觀點和判斷。但在作這種檢討和建議以前，我願意對我們這裏要涉及的問題本身，先作一點說明，以便達成一定的基本了解。有了這種了解之後，我們的探究就不致於散漫無歸了。

所謂基本了解，應該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應先說明「路向」的確切意義，換言之，我們談「路向」時，究竟是要談甚麼問題，以及為何會有這種問題出現等等，要先弄明白。

第二：說明了「路向」本身的意義後，我們應該進一步專就「中國的路向」着眼，再說明「中國路向問題」如何發生或形成。這就牽涉到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處境的了解。

第三：有了以上的了解後，我們應該明確地清理出來中國當前面對的真正的難題有那些；這是我們企圖對「中國路向問題」求解答時，最需要的具體了解所在。

第四：有了以上的了解後，我們還應該再作進一步的反省思考，弄明白我們所作的這種求了解的努力，本身有多少功能。這可以算是「對了解的了解」；有了這一層反省思考，我們就不致於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也就不致於陷入所謂「智性遊戲」(intellectual game)的老毛病了。

下面我們就依照上列的次序談我們的基本了解。

一、路向的意義

有人說：「路是人走出來的」；這是強調人能創造路。但「無路可走」卻仍然是人人都了解的話。足見人雖然創造路，這裏也有一定的限制。這個限制從表面上看，似乎牽涉到的只是人開路的能力或者條件問題。譬如人在原始森林中迷了路，只看見四面巨木森森，就覺得「無路可走」；但這只是因為人手邊沒有伐木的工具，更沒有開路機可用，所以開不出路來。在這個意義下，所謂「無路可走」，實在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已。不過，我們切不可以為人們迷路的時候，只牽涉到技術問題，因為事實上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人要找的是甚麼路？換句話說，這是人對所找尋的「路」本身意義的了解問題。

儘管我們不否認人可以創造路，可是千萬不可誤以為人可以隨意亂走而找出路來。這就牽涉到「路」的意義問題了。你真正相信凡是人能走的地方就是「路」嗎？如果你在森林中胡亂走去，結果墮入一個大泥潭；你是否認為你已經找到了一條「路」呢？當你跌入泥潭時，你是不是更覺得「無路可走」，或者「走上了絕路」呢？無疑地，當你腳踏敗葉亂石，從森林中某一點走到泥潭裏的時候，你似乎確實「走出了一條路」——到泥潭之路；可是這就是要找的「路」嗎？顯然不是。因為你在森林中找「路」的時候，你的目的決不能是走向泥潭。你要找的「路」，與你所追尋的目的是不可分的。明白「路」依「目的」而定其特性，我們就可以引入「路向」一詞。說「路向」就預認一種目的性，不像只說「路」時那樣容易使人誤解。

我們了解人找路的時候，一定涉及某種目的，就可以明白我們這時面對的問題實在是一個「路向問題」。這樣，我們對於有關找路的種種考慮，首先要從確定了解所涉的目的著手。目的清楚

了，路向自然可以逐漸清楚。一切技術問題實在屬於較低的層面，反而可以逐步解決。而目的若是不清楚，或者時時變易，則路向根本就無從談起了。

也許有人以為「目的」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例如在森林中找路時，目的自然是要到安全地帶或者要回家；似乎這裏沒有甚麼大問題。可是當我們考慮較複雜的路向問題的時候，情況卻並非如此。目的之不清楚，常常是一個嚴重問題。我們下面就「中國的路向」一問題稍作析論，便可以看見目的本身的清楚也不是那樣容易的事。

二、中國路向問題之形成

說到中國的路向，人們似乎都有一點朦朧的了解。如果我們問：為甚麼會有這個問題發生？很多人都會答覆說：因為中國多年來很貧弱，所以我們要找一條路走向富強；中國近百年來都受外國勢力的侵害或壓制，所以我們要找一條路走向獨立自主等等。這表示我們都覺得中國處於一種歷史的困境中，而要找尋出路。而這裏所牽涉的目的，也可以用「富強」、「獨立自主」等等熟悉的觀念來表述，似乎都很明顯，不難了解。

可是，所謂「富強」或「獨立自主」等等，都只是很廣泛的詞語。另一面，中國的困境也只是一籠統觀念。說這些話只能表示一種意向，並不表示有任何確定的主張。而沒有確定主張的時候，路向問題本身實在全無決定。正像我們要求一個兒童「做個好孩子」的時候，意向雖然好像很明白，兒童卻不知道我們究竟要他做甚麼事。我們只談中國在困境中要找出路、要富強、要獨立自主，並不能真正確定我們的目的。這樣，我們看見近百年來中國許多人在同樣的意向下，做出極不同的事，甚至互相殘殺，互相破壞；結果是，困境至今未改，而貧弱反而愈來愈嚴重，獨立自主也始終是個虛影。

中國人為中國找路已經超過一百年，但不僅未找到一條明確的路，而且連究竟應該找一條甚麼樣的路，也愈來愈覺得糊塗。

從滿清同治年間起，就有求富強的「洋務運動」，然後三翻九轉，各種口號此起彼落，許多運動都在中國出現；直到目前中共所號召的「現代化運動」為止，似乎又更接近最初的「洋務運動」了。畢竟我們要走甚麼路？應該走甚麼路？依然是個未解答的問題。而在這種翻騰中，中國的內在問題卻愈來愈複雜，創傷愈來愈嚴重。一種集體的精神崩潰的危機正籠罩整個中國大陸，連找路的活力似乎也步步衰弱下去了。

這是一串使人悲觀的事實；可是，面對這種事實，我們並不是只能悲觀地歎息。歷史的長程中，永遠有努力的機會，無所謂太晚。我們面對的現實環境，雖然充滿嚴重問題，但我們正應該有承當困難的勇氣，重新對中國路向問題作一番探索。

這種工作應該涉及兩方面：第一步我們對於中國所處的歷史困境應該重新了解，第二步我們對於出困之路要作確定的審斷。前一點即是本節所謂「中國路向問題的形成」的了解，後一點則屬於結論所涉的問題，會在以下各節中逐步求出解答。

(一) 中國困境的形成

現在，我們就先談中國的困境。

在回顧中國困境之形成過程以前，有一點應該先作清理的，即是：我們對於困境所涉及的內外因素要有明確認識。這裏如果看不清楚，則我們不但不能找到出困之路，而且會由於一些錯誤觀念，引生出一些錯誤行動，使困境本身愈變得複雜而嚴重。

就中國之困境說，近百餘年來中國的苦難，原由外來壓力引起；因此，好幾代中國有志之士，一想到中國的困境問題，都把注意力放在外在因素一面。這雖然是很自然的想法，但卻隱含著一個重大的觀念錯誤。這個錯誤，簡單說，就是不明白困境形成時，即是由內外因素合成；所以了解困境本身，與了解困境的起因不同。

讓我們隨意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分別。

假如有一個人在路上被車撞傷，因而肢體失去功能，這時，這個人陷入了一種困境。如果專注目於這個困境的起因，則顯然

它是由於那個駕車輛的人犯了某種錯誤而起。可是如果我們想要治療這個受傷的人，要使他脫出困境，我們卻不能只在那個撞傷人的司機和車輛一面着眼。我們縱使將那個傷人的司機處死，也無補於傷者的復原。換句話說，追究責任是一回事，解除困境是另一回事。我們知道傷者所以會陷入如此的困境，確應由傷人的司機負全責；可是同時也要知道療傷復原要涉及另外一套工作。這一套工作即以了解傷者的傷勢和整個健康狀況為依據，而與懲罰傷人者沒有多大關係。

這樣，我們不難明白一種困境何以是內外因素合成的。即以上例的傷者說，他被車撞傷，是外在因素；他自身的健康情況，包括受傷前後的種種生理事實，則是內在因素。而他這個「受傷」的「困境」一旦形成，便是由這些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共同決定。而我們要想使傷者脫離困境，恢復健康，便須直接面對這個困境本身，將內外因素了解清楚，才能找到脫困之道。僅僅追究外在因素，於事無補。

說到中國的困境、情形也是一樣。儘管外來的壓力是近百餘年來中國衰亂的起因，可是衰亂一經形成，便涉及中國內在種種因素；而要想脫困，更須對這些內在因素有確切了解。倘若我們只注目於外來壓力，而認為只要能排拒外來的「帝國主義」、便能使中國脫離困境，那就像說：只要懲辦了傷人的司機、傷者自會復原一樣，實在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我們明白了這點道理，則在考慮中國的脫困之路以前，就必須先面對已成的困局作一番確切的了解。正若要治療車禍的受害者，就必須先詳細了解傷者的整個生理狀況及受傷經過等等一樣。醫生在從事這種工作時，反而得暫時將懲罰肇事者的問題暫時拋開（儘管他自然也覺得肇事者應受懲罰）。因此，我們下面清理對中國困境的了解時，也不能不暫時將「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口號拋開。

中國困境的形成，原是一個動態的演變歷程；我們要達成一種明確的了解，便須從這個歷程中的幾個重要因素着眼。這些因素當然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兩面來談。

先就外在一面看。

前面我們用車禍作譬喻，說明了解困境與解除困境和追究責任不是一回事；這原是一種簡化的說法，目的在於表明了解困境不能只注目於起因一面。現在要進一步說明中國困境中外在因素的作用，仍然可以順着這個譬喻講，而將另外的條件加上，去，便容易使人了解。

通常傷人的司機，大抵由於不慎或技術不足而肇事，因此，傷者雖是因他而受傷，卻不必憂慮繼續受他的傷害或干擾。但現在說到外力對中國的影響，情況卻不同。當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勢力向東方入侵時，中國是受了傷；可是這裏的傷人者不像車禍之喻中的司機那樣出於無心而傷人；他們是有所企圖的。因此，好像一個意圖搶劫或謀殺的駕車人，原以傷人作為手段，要達到進一步的目的。這樣，西方入侵的勢力不僅傷了中國，而且還在「傷人」之後，繼續進迫，使得中國的療傷過程再受到干擾。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一面察覺中國面對西方壓力而陷入困境，另一面又看見西方勢力進而干擾中國療傷或脫困的努力，於是自然地將抗拒這種外力看成唯一要務。這是清末以來「反帝國主義」的「救亡」意識所以支配中國的政治思潮的原因。

然而，就中國脫離困境的要求說，這裏仍然含有一個極嚴重的錯誤觀念。因為，如上面車禍之喻所顯示，無論外來壓力如何相逼，療傷畢竟不能只靠抗拒外力而完成。一個意圖搶劫的司機，不僅撞傷了我，而且還在傷我之後繼續侵犯，干擾我療傷；這自然使我不能不在療傷時注意繼續抗拒這種壓力。但這並不表示只要我能不再受這個強盜司機的干擾，傷勢便可以自然痊愈。傷勢是一個已成的事實，它由我健康狀況與外來的侵害因素合成。要治傷需要另外一套努力；而這一套努力的成功，主要關鍵反大半落在我自己的健康狀況與可用的醫療條件一面，而不在侵害者一面。侵害者的干擾，固然加強療傷的困難；但縱使沒有了這種干擾，療傷還是不會自動完成。這裏倘若我們看不清楚，則本來已經很困難的局面就會變得更困難；而傷者的傷勢也會愈拖愈壞了。